

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

〔美〕吴秀良 著 张震久 吴伯娅 译



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

〔美〕 吴秀良 著

张震久 吴伯娅 译

DA5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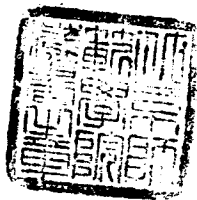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6043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北京



1160432

责任编辑：马晓光

责任校对：古为明

版式设计：王丹丹

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

Kangxi Chao Chuwei Douzheng Jishi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发 行 所 在 处 经 销
自 贡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12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册

ISBN7-5004-0009-8/K·1 定价：1.50 元

出版说明

康熙晚年,激烈的储位争夺和后来雍正的嗣位,是史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它关系到康、雍两朝的政治,关系到对雍正帝的评价。从三十年代至今,学术界曾就此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雍正是矫诏夺位;另一种意见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1979年,美国出版的《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一书,是国外学者探讨这一问题的一部专著。

作者吴秀良,美籍华裔,1954年台湾大学学士,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博士,现任美国波士顿学院历史教授,兼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清初奏折制度之发展》等书。

在《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中,作者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详尽地叙述了康熙帝废立太子的历史过程,对参与储位争夺的各种政治力量进行了深入剖析,明确地提出了雍正是康熙亲自选定的继承人。作者的研究所得,对于开扩我们的视野,把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无疑是有益处的。本书的写法也很有特色。作者试图从对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分析入手,去把握历史事变的内在原因,这样的努力无疑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全书行文流畅,叙事生动,仿佛在向读者讲述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因此,这部学术著作又具有相当的通俗性和可读性,相信它会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和对这一历史问题感兴趣的读者的喜爱。

应当指出，本书的论证过程及其结论，都还有若干可以进一步商量的地方。譬如，作者过分强调了康熙的忠孝思想，以“孝”作为理解康熙的关键，并使之贯穿全书，甚至把严酷的政治斗争也都与“孝”联系起来。这种观点虽然新颖，但值得商榷。其他失之偏颇之处，读者当不难发现，不赘述。

本书原名《通向权力之路——康熙和他的法定继承人》，为方便读者，翻译时改为现名。本书译完之后，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祖武同志审读润饰，在此深表谢意。

译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目 录

序幕	1
第一部分 笃遵孝道	11
1 祖母	11
2 第一位皇后	18
第二部分 殷切期望	26
3 继承人	26
4 南方文人	34
5 冲突的迹象	48
6 代理国务	53
第三部分 冥顽不化	61
7 不祥之兆	61
8 南方的诱惑	75
9 觊觎皇权者	96
10 废黜太子	101
第四部分 迟疑不决	111
11 虎祺派	111
12 储君复立	119

13	终身监禁	133
14	新的竞争者	142
第五部分	临终决断	162
15	新皇帝	162
尾声		168

序 幕

1708年10月17日，康熙皇帝在内蒙的狩猎御营中，采取了一个震惊整个东亚的异乎寻常的行动。他下令锁拿三十五岁的皇太子胤禔，并当着满汉王公大臣的面，痛斥胤禔“不仁不孝”。他声称，胤禔于昨夜潜入御营，图谋行刺。随即他宣布废黜太子，押回北京，终身监禁。

康熙为了向天下臣民证实他作出这一断然抉择的英明，出人意料地公布了胤禔的恶劣行径，诸如“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乃至蓄谋暗杀皇上，篡夺皇位。怒不可遏的皇帝深信不疑，胤禔简直是个狂人。

然而，将废黜太子一事昭告天下之后，康熙却又为若干他无法解释的现象所困扰，夜间常做怪梦。他因而相信，这一切都是鬼魅作祟，胤禔被邪物缠身，所以才言行失常。于是，在镇服了所谓附在胤禔身上的妖魔之后，他于翌年春复立胤禔为太子。可是三年后，即1712年，康熙又不得不再次宣布废黜胤禔，而且是永久废黜。人们确认，胤禔患了疯疾，绝对不适于继承这样一个大帝国的统治权。

废黜胤禔，不过是三千年来的中国历代王朝中屡见不鲜的：

皇权之争的一个高潮而已。在此之前，一系列令人瞠目的父子对垒，形成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紧张关系。之后，为争夺储位，诸皇子之间又爆发了一连串更加激烈的斗争。1722年，储位角逐因康熙逝世而戛然中止，代之而起的则是一场刚登基的雍正帝与其他皇子的斗争。这场斗争旷日持久，直至雍正最终清除了所有图谋倾覆其统治权的兄弟为止。大约在1730年前，这种皇室兄弟间的党争，一直是雍正朝（1723—1735年）前半期的头等大事。

这段悲剧性插曲，不仅对当时的朝政和满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且也给尔后中国历史中的个人独裁开了先河。确实，倘若当初胤祹继承了康熙的皇位，那么，整个东亚的历史就可能会朝着全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毋庸置疑，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能基于假设，而应当依据史实。人们之所以对本书所叙述的这段历史感兴趣，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它阐释了人类的经历，另一方面则在于它在世界史上所具有的特定意义……

本书所叙述的历史，只是满汉两个民族两种文化斗争的一个部分。它生动地表明了，在军事上占优势的满人，如何去吸取在文明程度上占优势的汉人的文化。它不但揭示了两种传统的尖锐斗争，同时也揭示了属于同一传统的满洲统治阶层内部的尖锐斗争。他们有时同意吸收汉族文化的某些成分，然而却不能容忍其他成分。

应当从何谈起呢？清朝入主中原，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历史就发生在这一事件之后，因而，我们的叙述便以此为背景来展开。

象西方高度文明的地中海地区一样，中国也曾多次或部分、或全部被北方的游牧民族所统治。蒙古人最先统治全中

国，他们建立了元朝，其统治从1260年延续到1368年。满人是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获得北京皇权的少数民族。他们创建了清帝国（1644—1911年），声称“受天命”而统治全中国。尽管他们人口少（满人仅占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却远比蒙古人更为成功地控制了汉人。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清初统治者以汉制汉政策的成功。早在入关前后，满人便承袭汉人的道德标准、政治观念及机构体制，在政府中启用汉族的文人学士。在清廷统治机构最终成型之前，这一汉化的过程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康熙朝（1661—1722年）是一个关键阶段，譬如康熙帝册立太子，就是从明代承袭过来的。他与太子之间的斗争，也就发生在满人为建立正统王朝和有效的政治机构而全面吸收汉族文化的漫长过程中。

康熙的祖先属于南满边境地区的女真族。他们在谋求中国的皇权之前，早已受到汉族的影响。后金国的创始人努尔哈赤（1559—1626年），年轻时就与汉人频繁接触，因而对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颇为熟悉。他在短期内便征服了满洲的敌对部落，建立起半集权制的官僚体制。他生前创建了一种基于满洲原始氏族结构的社会组织，即八旗制。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一种带有浓厚的奴隶制成分的封建集权结构。

努尔哈赤的继承者们加速了集权的进程。在太宗（皇太极，1592—1643年，于1627—1643年在位）当政时，汉族政治制度的某些成分已经被初步移植过来。之后，顺治朝（1644—1661年）更承袭了一套完善的汉族制度。在顺治帝的叔父多尔袞摄政期间，这种承袭尚具有选择性。而1650年多尔袞死后，顺治亲政，便全面照搬明代制度，包括再次确

立宦官机构。这一机构在明代后半期的朝廷中一度占据支配地位，多尔袞摄政时曾被废止。顺治于1661年死后，满洲统治阶层对他的毫无选择的汉化政策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当玄烨被其弥留之际的父亲顺治指定为继承人时，年仅七岁，于是由以满洲的实权人物鳌拜为首的四大臣摄政。摄政大臣有计划地清除了政治机构中的汉族成分，甚至所有的官衔也改回满语。许多满洲贵族坚持对抗汉族影响，不愿在朝中见到汉族的文人学士。

1668年，康熙帝玄烨达到亲政年龄，他清除了鳌拜集团，并很快意识到政权极不稳固，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因为此时台湾尚在忠于明室的将领手中；从东南到西南的许多省分仍置于称为三藩的汉族军阀的统治之下；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该地区包括一些重要城市，特别是扬州、杭州和苏州），反清斗争依然激烈，而且存在演为大规模对抗的可能性（南方人对顺治朝期间清廷所实行的屠杀记忆犹新。仅扬州一处，清军在十天内轮奸妇女，杀戮了二十五万人。其他城市也在清军手中遭到类似的厄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康熙制定了大规模承袭汉制的政策，以完成未竟的统一大业，并为满人统治中国的政体打下坚实基础。

满人统一全国和康熙的政策，是我们了解康熙父子之争的重要依据。不过，为了理解这段史事所独具的特色，我们需要熟悉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中国的政治和文化。

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南北文化的差异而形成的对峙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中国北方的长城象征着游牧民族所造成的不幸与困扰，那么，连接北京与南方的大运河，则折射出北方统治者们在维系对南方的政治控制所遇到的难题。这一难题在于，如何利用南方的人力和物力，而又不至于为它那几

乎是不可抗御的魅力所诱惑。

早在六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南方就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在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220—589年）中，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而被迫南迁的汉人形成了一种比北方更为安逸、优雅、奢侈的生活方式。历代治乱兴衰，都不曾改变这种文化特色。

扬州是南方文化的缩影。它坐落在大运河、长江和淮河汇合处的战略要地上，是国内贸易的枢纽。清初开发南方物力的政策，使一个新的经济阶层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兴起。这个阶层赋予扬州地区更加浓厚的经济意义。内务府把盐的垄断权交给富商，而富商则向政府缴纳盐税。这些商人如同皇帝私人官僚机构的经济杠杆，被称之为“内务府商贾”。他们中间许多人或是颇有势力的汉军旗官员的亲属，或是大权在握的满洲大臣们的随从。这些商贾贵族挥霍无度，南方形成了奢侈的生活作风。他们之中，有人挥金如土，一天可以花去万两白银；有人如痴如狂，仅仅为了取乐而在金山顶上的塔上往下抛撒金箔；有人甚至把一群木雕裸体女人置于内厅前，用机器操纵，以取乐宾客。他们竞相夸奇斗富，花样之多难以尽述。

不过，并非所有的新贵都俗不可耐。一些附庸风雅的盐商也资助学者和诗人，养成了热衷于藏书和鉴赏艺术品的奢侈嗜好。许多南方的著名学者以及康熙朝在职和退职的官员，都先后游览扬州，体验南方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些人还与有钱有势的盐商保持着密切关系。

这两类不同的人，即粗俗者与文雅者，由于对女色的兴趣而趋于同流。扬州妇女以文雅、缠足而著称；苏州妇女则以发式精美而闻名。当地的文人和来访的官僚，跟富有的盐商竟

相在扬州纳妾蓄妓。明朝末年，镇守满明边界战略要地山海关的汉将吴三桂，之所以迎清军入关，原因之一就在于报复李自成，因为李劫持了吴的爱妾陈圆圆，陈曾是红极一时的名妓。另一位江南名妓李香君，由于对侯方域（著名诗人，南明政客）忠贞不渝，成了孔尚任的著名悲剧《桃花扇》的女主人公。在康熙恩准《桃花扇》首次在宫中上演后，该剧一时成了宫廷中人人必看的剧目。其他的学者官员们也以纳妾为荣，并为有扬州妾媵而自吹自擂。

康熙对南方文化的喜爱，促成了清廷赞赏南方生活方式的倾向。身居要津的满洲大臣，如明珠，就聘用了南方的文人学士做家庭教师，他还购买南方的青少年当仆人，因为这些人灵敏、俊秀、可爱。另一些大臣则开始收藏稀世书籍，搜集宋明画卷，他们还激发了满洲统治阶层对南方戏剧和苏州烹饪的爱好。南方的文人纷纷被召请为皇室效力，与满洲大臣为争宠展开了角逐（这正是为祸于康熙朝前半期的激烈党争的起因）。

1684年，康熙首次南巡。江南的自然美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因此决定在北京西郊开辟一处皇家花园（即畅春园——译者），以经常唤起对南方的美好记忆。皇家花园的设计完全模仿江南园林，康熙的多半岁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北京城内的宫殿仅用于举行仪式而已。不过，体魄健康、严以律己的康熙能够抵御南方文化中的淫逸成分，但这并不是随员们都能做到的。在他们多次随驾沿运河南巡时，其中有些人就被南方的声色魅力所迷惑。

正如文化差异往往造成南北间的对峙局面一样，在满洲统治阶层内部，也存在着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社会政治紧张气氛。这最终迫使满洲统治者试图把汉族的政治结构移植于

八旗制。汉族的君主专制体制，基于孔夫子的“天下--人而已矣”的思想，皇帝持有绝对的权力。而八旗制则是一种集权的封建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的封建领主（八旗贵族）把家臣视为个人的奴仆（起码在名义上是如此），并强使他们忠于自己。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当一个家臣（特别是包衣，即奴隶）入朝充任高官之后，他的主子依然保留控制其社会生活的权力。主子有权体罚家臣，许多人在任意指控的罪名下被拷打致死。一个家臣仅仅因为酗酒而被折磨致死后，主子便可以占有他的妻子。

这种八旗内部忠于主子的制度，显然与皇室对臣民绝对效忠皇帝个人的要求相抵触。在清初的几十年中，皇权稳步增强，贵族的世袭权力逐渐削弱。但效忠主子和忠于皇帝的冲突，依然在满洲统治集团中造成了紧张局势。总的说来，康熙比其继承人宽容这种效忠的双重性。在他当政期间，也因之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直到雍正朝，这种双重性才被消除。

清代初期，八旗制内部的奴隶制与汉族的奴婢制相渗透，使整个的蓄奴制度盘根错节。尽管买卖奴婢是合法的，仍有许多人自愿投充为奴。一些汉人为了得到经济保障而放弃自由，归附于满洲贵族，或把儿女卖给属于汉人或满人显贵的戏班。此外，在八旗奴隶制内还存在另一个奴隶制。大部分旗人仅是名义上的奴隶，而包衣则是满洲王公和皇帝本人的真正奴隶。这些包衣或是战争中的俘虏，包括蒙古人、汉人和朝鲜人；或是被判决的罪犯的亲属；或是因穷困以及与家庭失散而自愿投充为奴者。

在皇帝的支配下，包衣构成了私人官僚机构内务府的基础。他们与太监、宫女一起负责照管皇帝个人的起居和衣、

食、住、行及安全。内务府可委派他们到京外任职，譬如，任江南织造，也可直接在朝廷各部中任职。

包衣之下是辛者库（向内管领领取给养的奴隶），他们构成了内务府中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在内管领管辖下的奴隶，或是关外时期罪犯的后裔，或是被判罪的满汉高官的亲属。可以说，他们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他们在内务府从事各种最卑下的工作。这类人改变地位的一个方法，是力图使自己的女儿被选为宫女，并进而成为嫔妃。康熙第八子胤禩的母亲即出身于辛者库（当胤禩投入储位之争时，出身与才干的冲突竟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文化及社会政治所造成的对峙，是康熙朝政治斗争中起催化作用的重要因素。不过，这场斗争也纠缠着主人公们的自相矛盾的行为。为了便于理解，我们还必须透过外在的影响，去把握这些人物的内在倾向性。当我们用今天众所周知的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去观察历史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变态心理学，即康熙对其儿子的爱怜和纵容是如何地反常；胤初的情绪紊乱和权力欲又是如何使他发狂。在这个问题上，超自然的灵学，也以鬼魅和怪梦的形式起了一定的作用。固然，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当相信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主人公们的情感 and 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

这便把我们引向了尽人皆有的动机问题。由于目前仍缺乏对中国历史人物的心理研究，因而本书不可能提出一套完整的中国心理学理论。但是，需要依据一定的理论体系对这段历史进行叙述和分析。基于这一设想，我随之提出一些与人的动机有关的事实，以便使我们能够理解康熙父子关系的特点和内容。这便是社会科学家们常说的价值观。

在西方，分析人的行为的价值观已经司空见惯，然而在中国的学术界，我们则刚刚看到它的端倪。在皇权继承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无疑是权力。不过，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对权力所持的态度，却又是不相同的。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有些人大权在握但并不重视它，正如哈罗德·D. 劳斯维尔所说：“在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有人“不爱江山爱美人”，自愿放弃王权；也有人玩世不恭，全神贯注于艺术追求（例如八世纪的唐明皇和十二世纪的宋徽宗）。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也有一些统治者把持权力不放，以致激起暗杀行动；还有一些权欲熏心而手中无权的人，则试图发动政变。在中国历代王朝一百八十个继承皇权的事例中，就有一百一十八个涉及到暴力和谋杀。

无疑，大多数皇权继承危机还包含着其他因素。康熙朝的继承危机就包含着一些自相矛盾的现象。例如，当康熙年富力强时，他并不看重皇权，甚至想退位。然而到了晚年，他却把持皇权不放，直到老迈龙钟也不松手。他在最后十年中对皇权的控制，酿成了朝廷激烈的斗争，甚至给他招来暗杀的威胁。

解释这种矛盾现象以及本书中许多使西方读者迷惑不解的部分，其关键就是“孝”。在康熙心目中，这个字代表着强烈的感情上的义务，而不单单出自儒家的说教。当康熙称许某人“孝”，或抨击某人“不孝”时，他并不是在做无关痛痒的评论，而是在做举足轻重的判断。同样，当他自己对某人，譬如对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怀有诚挚的敬爱之情时，他也把这种感情归纳为“孝”。他的感情是如此深切，以致影响到他的潜意识，当他与儿子的紧张关系变得难以

承受时，这一点就越发清楚了。因此，我们必须从康熙早年，即“孝”在其心中生根之日开始，来探索他的内在倾向。

如同一位音乐家演奏手风琴一样，我已经把本书所涉史事的文化及社会政治诸方面的广阔背景拉开，随后便要以人的动机为中心把它压回来。这一手法将在本书中反复使用，以便使这场人间戏剧与政治历史和谐地逐幕展开。